

论当代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的主权与人权

——以利比亚战争为视角

宋瑞兰

内容提要：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这场汹涌澎湃的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的鲜明主题。掌握国际人权干预的合法性、合理性根据及其必要限度，正确认识主权与人权关系理论，深入分析当下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主权与人权关系的社会实践与社会问题，对于推动当代法学和政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伊斯兰社会运动 主权 人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 (2012) 01-0071-08

作者简介：宋瑞兰，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3）。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引火自焚，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为生存和尊严抗争，旋即犹如蝴蝶效应般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诱发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海啸：29天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18天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一向控制很严的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了延续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最让人惊愕的是，这场社会海啸居然催生了利比亚的空前内乱和西方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大动荡。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与历史嬗变给我们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思考。本文主要以利比亚战争为范本，对这场社会运动中涉及的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进行概要分析。

一、这场伊斯兰社会运动中涉及的基本主权与人权问题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人权理论和国际人权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场具有广泛和深刻世界意义的伊斯兰地区社会运动与社会变革中，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无论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遭遇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两者关系也成为这场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鲜明主题。近几年来，由于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多起激烈的国际争端。先看几则材料。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3月19日晚，美、英、法三国对利比亚实施“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率先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自此，利比亚面临着如何维护主权与保障人权的严峻挑战。

2011年4月2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叙利亚局势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议谴责叙利亚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器的行为，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叙利亚派遣调查团，就该国

可能存在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展开调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 47 个成员组成。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等国在会议上投下反对票，认为决议草案干涉叙利亚内政，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2011 年 10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法国、英国等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中国反对，印度、南非、巴西、黎巴黎弃权，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美国等赞成，决议草案未获得通过。这是 2008 年 7 月中、俄两国否决有关制裁津巴布韦决议草案以来，再次联合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阿拉伯新闻网的评论认为，叙利亚局势异常复杂，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在中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足轻重的国家。如果这次通过决议，等于向西方接下来的军事干预敞开了大门，中东将走向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①

2011 年 5 月 19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务院发表中东政策演讲。奥巴马对从突尼斯开始陆续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的运动大加赞赏，称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人权民主运动成为美国外交的“最优先议程”。奥巴马谴责了镇压示威者的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等，指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接受政治改革，要么下台，也门、巴林等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美国将动用一切可能的影响力来鼓励该地区的政治改革与人权民主进程。

由上可见，目前这场波及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中的主权与人权关系呈现出比以往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更加复杂的形态与特质，尤其是利比亚的“一国两主”格局。^②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相关联的基本问题：一是以保护人权与民主为理由，对一国进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是什么；二是如何准确把握人权的国际干预的必要限度、合适方式以及相应纠错机制的建立。认真剖析这场伊斯兰社会运动中涉及的主权与人权这一基本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主权与人权。

二、人权的国际干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

在目前西亚、北非等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乱局中，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以利比亚为例：自从 2011 年 3 月 19 日美国、英国、法国展开“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至今，利比亚国内战火纷飞，不断造成平民伤亡，大量难民出逃，基本军事设施包括许多民用建筑、商铺等严重毁损，使得本来旨在保护利比亚平民及其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威胁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1973 号决议实施的结果却造成了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为严重的人权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的国家主权、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也遭到了严重损害，现代社会中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的复杂图景又一次真实而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这场由西方主导的利比亚战争是否至今

① 最近叙利亚的危机突然迅速升温。就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美国与叙利亚相继宣布召回本国大使，与此同时，美欧多名要员建议北约应当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平民。美叙之间外交对抗突然升级，令国际社会纷纷猜测卡扎菲死后，谁将会是美欧“战争之剑”的下一个目标？叙利亚会否成为北约战机之下的又一个利比亚？

② 这是卡扎菲政权未推翻前的情形。事实上，在卡扎菲政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在班加西组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陆续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外交承认。就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会，包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 32 个国家和 7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联络小组在会议声明中敦促卡扎菲下台。由此，出现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中罕见的“一国两主”格局。如何认识这种“一国两主”及其相关的政治法律问题，是当代法学与政治学的新课题。

仍然具有合法性，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以保护人权为理由，对主权国家进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又是什么？

这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权与人权。人权的充分实现与国家主权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国家权力又是对人权最具危害性的侵害者之一，如何以有效的方式遏制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可能的侵害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于国家权力的约束有国内和国际两种方式。在 20 世纪以前，对于人权的保护主要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随着世界历史的展开和国际社会的形成，也随着全球化潮流的日益激荡，对于国家侵害人权的国际制约机制发展起来了，由此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成为人权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产生了相应的理论。对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干涉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保护普遍人权，这种干涉和近代以来形成的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容易形成冲突。所以在当代的关于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之间的关系。不干涉内政原则着眼于国家主权独立，而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原则则着眼于国际社会人权与正义的维护。有学者指出：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普遍的价值观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冲突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主要特色。所谓普遍的价值是指人权、环境、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主要欧美发达国家主张的种种适用于世界任何国家体制、文化、宗教的价值。与此相反，依据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否接受这种价值观应由各国自行判断，别国不得干涉。这一原则是欧美各国所创立的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且随着曾历受欧美列强干涉的亚非国家在数量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多数，这一原则的意义进一步加强。不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基于国际人权干涉原则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强大地位，对一国人权状况所进行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就成为最有力度、也最有争议的限制国家主权与权力的方式，这种干涉已经在联合国的法律实践中被不断加强。所谓国际人权干涉也称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这种残暴或迫害是如此地野蛮和广泛，以至于否定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撼了人类的良知，承认某些国家为保护人权进行干涉而使用武力为合法。在这个时候，人权是高于主权，人权法是高于主权国家的法律的。

这是一种人权高于主权论，是基于人权的国际干涉的主要理论根据。关于当代的人权干涉的理论根据，人们提出了多种看法，如有“人权无国界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主权过时论”、“人权国际化论”、“新干涉主义”、“失败国家论”、“新帝国主义论”、“进驻黑洞论”等等，^①这些论调的核心就是人权高于主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逐步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权力，这种权力的壮大也使得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被动摇了，主权国家在主权绝对内政的名义下任意对待其国民的正当性也被这个理论动摇了。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对于国际人权干涉所作的辩护无疑是代表了欧洲学术界的一个权威解释。他反对将国家这一现有国际法的主体自然化或道德中立化，因为国际法的主体以其在 20 世纪灾难史中留下的斑斑血迹证明，认为古典国际法是清白无辜的这一推想是极其荒谬的。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以人权驯化国与国之间的自然关系，这样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公民法，已经摆到议事日程上了。以世界公民形态来看，国际社会的道德主体和权利主体不仅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也应包括具体的个人和群体。而个人及局部群体在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却一直是古典主权论所要排斥和否认的。人权法则在这一点上与古典主权论是针锋相对的。人权法则使得个人或群体获得向国际社会申诉的权利，而国际社会也因此不允许违反人权的统治者以国家为借口，逃避其罪行的法律责任。世界公民团体所有的直接成员也要保护那

^① 罗艳华 《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2 页。

些受自己政府欺凌的公民。超越国家主权的法律最重要的后果是——正如皮诺切特案件所显示的那样——让那些官员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任职时犯下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①人道主义干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人权的国际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国际人权干预的必要性与被滥用的可能性一直是困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问题。如何在保护公民人权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人道主义干涉与不干涉内政之间取得平衡，是个被广为关注的问题。^②利比亚战争在当今国际关系史上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独裁者被内外武力联合推翻，而是一种新的国际干预模式的问世，就像前南“人道主义干预”模式、或伊拉克反恐战争的“先发制人”模式。事实上是冷战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创出的一个新的干预模式：以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动荡为机遇、以支持反政府武装为掩护、以联合国决议为幌子、以空中轰炸为手段、以“保护平民”为道德借口，实现推翻一国政府的目标。而这一模式是由法国首创，难怪法国外长朱佩对此备感兴奋，承认承担了40%军事干预的法国“冒了巨大的风险”，但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推翻卡扎菲政权。法国媒体没有忘记加一句：法国获得利比亚全国过渡政府给予法国各个领域、特别是石油开采的优先权的承诺。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回应，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因而是作为一场合法、正义战争而载入史册。科索沃战争则是北约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空中干预，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许可。当时动武的主要借口是法国前外长库什内创出的“人道主义干涉权”，因此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一场非法的、北约发动的“人道主义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以“9·11”事件为契机，发动了对恐怖主义的“先发制人”战争。这场战争同样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因此被希拉克总统领导的法国等反战轴心认定是一场非法的战争，是“入侵”了伊拉克。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则创出了一个新模式。

众所周知，利比亚国内出现社会动荡，民众从抗议走向武装起义，遭到卡扎菲政权的镇压。就在卡扎菲的坦克即将进入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市前夕，法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准许外国以保护利比亚平民为由，对利比亚实施空中禁飞。在联合国决议中有一句关键性的话，即为保护平民而建立空中禁飞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正是这句话的模糊属性，使法英两国借机对利比亚进行了长时间空袭。在长达6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北约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早就将建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演变成以空袭为手段来打垮卡扎菲政权作为唯一目标。

由此可见，有关国家在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合法形式下，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挟带私货”，过度使用武力超越了联合国决议授权范围，完全无视禁飞区的存在，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伤及无辜平民，严重损害了利比亚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俄罗斯总理普京就把空袭利比亚看作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他对此批评说，“人们都在谈论禁飞区。如果他们每天轰炸，那禁飞区在哪儿？我们看不见它。我们的行动必须遵循国际法，同时谨记责任，关切爱好和平的平民。当所谓文明社会拉帮结派对付一个小国，摧毁数代人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是好是坏？我个人不认可这种行为”。普京认为，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是出于石油利益考量。“利比亚石油资源位居非洲首位，天然气资源位居第四，这难道不是这些军事行动的主要利益目

① 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读书》1999年第9期。

② 有学者认为，国际人权干预之所以困扰人的原因，在于当代国际社会内在的现实矛盾，即主权国家的并存与经济信息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对于普遍性人权价值的肯定与发展中国家的被害者意识之间的矛盾、经济实力与知识霸权之间的国际矛盾。相关内容可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研究》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页。

标”？^① 纵观利比亚局势发展进程可以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本身是合法的，但是执行这一决议的方式、范围与程度显然已超出了安理会决议授权的范围，偏离了联合国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人权与权利的初衷，其结果不但未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相反却造成了利比亚国内更严重的人权危机与国家主权被侵犯。从国际法角度看，有关国家至今为止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很难说具有完全合法与正当的性质。诚然，利比亚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存在着国内人权保障不力的问题，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府也不是现代民主政府，但不管利比亚国内的人权状况与政治体制是什么，利比亚都是国际法上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以人权保护为理由，不当使用甚至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损害利比亚的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是违反基本的国际法准则的。如前所述，国际人权干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自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来保护人权，但是这个方式运用不当所带来的恰恰是对于人权和主权的侵害。这个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的国际法理论现已在利比亚冲突中被滥用，甚至成为有关国家武装干涉利比亚内政的借口。因此有学者认为，基于人权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观点是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是很危险也很有危害性的一种理论。应当警惕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以及国际人权干预的消极后果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三、人权的国际干预的必要限度

国际社会可为人权提供国际保障，并不等于可以随意干预一国人权问题，因为那可能构成对一国公民的重要集体人权——主权的侵犯。从法律上看，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人权干预的法律标准与必要限度缺乏具体、明确的权威性规则。实践中基于人权的国际干预手段主要有三种——国际舆论、国际法院和国际强力干涉。所谓国际舆论主要是对一国人权保障不力及侵犯人权现象给予的批评与谴责。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别国人权状况所作的负面评价与指责，大体上就属于这种国际人权干预的舆论形式。例如 2011 年 4 月 8 日，美国发布了《2010 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中对涉及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指责，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更是说三道四。美国这种做法就可视为国际人权干预的舆论形式。对此中国官方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认为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其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受到损害。^② 国际法院在现代国际人权干预中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从实践中看，国际法院主要是对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领导人进行审判。回顾冷战期间，的确从未有侵犯人权的国家领导人接受审判。所以，2008 年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刑事法庭对米洛舍维奇和卡拉季奇侵犯人权罪的审判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这方面的作为，也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开启了新的进程。接下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审判、秘鲁对前总统藤森的审判、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布逮捕令，后冲突时代的刑事审判大潮风起云涌，举世瞩目。这究竟是胜利者的正义还是正义的胜利，短期

^① 《西安晚报》2011 年 4 月 28 日“世界新闻”版。

^② 中国人权基金会编《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第 55 页。

内难有定论。而对于这种政治转型期的审判能否顺应历史潮流,相信历史会作出更为公正的评判。^① 国际强力干涉一般表现为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不合作态度或经济制裁、政治制裁直至战争。对一国人权状况进行国际干预的手段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严格遵守“比例原则”,应当用最小代价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在可以采取协调手段时不用强制手段;后果越是严重的手段,应当受到越严格的实体法与程序法限制。特别是战争作为国际人权干预的最严厉手段,本身不可避免会对人权与主权构成新的侵犯,所以战争作为干预人权的手段必须慎之又慎。目前国际人权法对于战争作为国际人权干预的条件与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理论上说,动用战争作为国际人权干预的手段起码必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一是一国人权问题极端严重,它涉及大量无辜公民的生命权;二是战争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性,除战争以外别无它法;三是联合国授权。^② 只有使人权的国际干预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才能达致一国主权与人权的恰当平衡。那么在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中,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否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置,战争是保障利比亚人民的人权、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吗?利比亚战争是一场控制在必要限度内的战争吗?

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从法理层面上看,解决利比亚冲突的手段尤其是战争已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未达到恰当的平衡。这可从两方面分析:首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范围被突破。如前所述,基于保护利比亚平民人权的目的,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然而在这场先由美国、后由北约主导的执行禁飞区决议的过程中,禁飞区范围被任意扩大,我们看不到禁飞区在哪里,所能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飞机飞越利比亚领空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轰炸任何一处它认为应该摧毁的目标,即使是误炸也在所不惜,利比亚的国家主权与人民人权均遭到了严重损害。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称,持续 8 个月的内战致使超过两万五千名利比亚人死亡。由此可见,在利比亚不存在禁飞区。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正式名义是在利比亚国内冲突中保护平民、保障人权,但实际上西方是把自己置于这场利比亚内战中反对派一方,寻求卡扎菲下台以谋求自身利益,其行为方式明显超出了联合国决议授权范围和必要限度,违背了安理会设立决议的初衷,践踏了联合国决议,很难说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范

① 这涉及选择性正义问题。例如,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国际社会维护正义的一个体现。但在西方主导下,这种正义只是选择性的正义,它归根到底还是要体现西方的意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受到法庭指控,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而同样被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科索沃前总理哈拉迪纳伊则被宣告无罪。西方这种做派并不新鲜,因为一切都要顺从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事实上,那些被西方特别是美国视为邪恶敌人的许多人都曾接受过美国的援助,如萨达姆、拉登等。美国当时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当时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后来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后来反对美国利益。在有美国支持时,拉登是在阿富汗反对苏联占领的自由斗士,在受美国抓捕时,拉登则成了反人类的、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未经任何正当法律程序,射杀拉登,也成为美国正义之举。西方及美国的逻辑是很明显的:一般情况下正义需要维持,如果正义需求与其利益相合,则要大力宣传与执行;如果正义需求与他们利益相悖,则要把正义放在一边,或是祭起另一面正义大旗来压倒它。这种选择性正义做法维护了西方及美国的利益,但却最终损害了世界正义的信誉。

② 周永坤 《法理学——全球视野》,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61 页。

范围内的合法的军事行动。^①从法理上看,欧美对利比亚发动空袭,就有钻联合国决议空子、假公济私嫌疑。战事越继续,欧美这种真实面目暴露越明显。正因如此,俄罗斯总理普京、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以及伊朗总统内贾德等均指责西方这次是“为石油而战而非为人权而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对与利比亚内战同时进行的科特迪瓦的激烈内战,西方国家却熟视无睹,根本无意进行任何形式的国际人权干预,这也再次坐实了对西方的指控。

其次,战争不是妥善处理利比亚主权与人权关系,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唯一选择,更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战争本身不可避免会对主权与人权构成新的侵犯。在可能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利比亚冲突的情况下仍然使用武力手段,从法理上讲就已超出了解决冲突的必要限度。事实上自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尤其是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一直未放弃经由政治途径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异常艰难,但时至今日,完全可以说战争绝不是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唯一和不可替代的手段,更不是成本最小、最好的手段。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军事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利比亚危机,应当寻求政治途径进行解决,而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利比亚人民去完成”^②。从历史与现实看,大凡处于战火之中的国家主权与人权实则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我们知道,由于美国为了创造侵略条件,通过十几年的长期挑动、组织、策划,使得伊拉克的地区矛盾、民族矛盾、族群冲突、教派纷争十分突出,军事占领后局势动荡,暴力冲突不断必然产生新的安全问题。伊拉克天天处于爆炸之中,每天都有无辜平民伤亡的报道。因此在别的国家军事占领统治下,一个失去了主权的国家及人民是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在枪炮威慑下是没有什么尊严、公正可言,换言之,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2008年美国审判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及其政府成员,真正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法律判决的合法形式掩盖其侵略伊拉克主权国家的非法性。伊拉克事件印证了法律这一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也印证了“强权就是真理”、“胜者为王败者寇”这一国际政治丛林法则的正确性。目前这场业已结束的以保护利比亚平民人权名义进行的战争,实则难以保障普遍的人权,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是这场战争中的常见景象。^③

处于战火之中的利比亚难保普遍的人权,也难保完整的主权。对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而言,他心中一直期许着“也许命运会悬崖勒马,捎来一些好消息,实现我的希冀,满足我的需求,在各种演变之后表演一幕喜剧”^④。然而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让喜剧走开。卡扎菲本人和儿子穆塔西姆于10月20日在苏尔特被俘后遭虐待并被打死。杀死卡扎菲一事存在违背《日内瓦公

①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作为主要参战国,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招致合法性质疑。2011年6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奥巴马政府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众议院当天以268票赞成、14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由众议长博纳提出的决议。决议说,奥巴马政府未能在对利比亚发起军事行动60天内获得国会授权,违反了美国《战争权力法》。决议同时要求奥巴马政府就美军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范围、成本、持续时间等向国会提供更多信息。《纽约时报》对此评述说,美国海外军事行动期间,国会就战争授权与总统对立,情形颇为罕见,显示民主、共和两党确有不少议员反感奥巴马绕过国会下令动武。这说明无论美国或北约,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及其限度本身都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② 来源于人民网,2011年4月10日。

③ 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利比亚战争的受害者,利比亚政局动荡也对我国在利比亚从事承包工程的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合同搁浅、项目停止、驻地遭袭、大规模撤侨等,利比亚局势动荡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损失显而易见。据相关专家估计,中国近200亿美元资金在利比亚利益洗牌中有可能“打水漂”。

④ 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修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约》的问题。根据《日内瓦公约》第 13 条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不作为可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伤。战俘亦应在任何时候受到保护，尤其免致遭受暴行或恫吓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对战俘之报复措施应予禁止。”从现场视频看，卡扎菲被俘后向武装人员求饶，但遭到殴打。武装人员说“我们所有人轮流扇他耳光，非常用力。一些人用脚踢他，这是传统的侮辱方式。”直到 10 月 25 日之前，卡扎菲上身赤裸的尸体一直被放于米苏拉塔一处冷藏库中供人“参观”了 4 天。这样对待战俘尸首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国际法规定，是否独裁者就不在人权保护之列，也值得探究。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月 25 日对利比亚公开播放卡扎菲临死前的画面提出了异议，认为即使是“罪恶滔天”之人在将死时也应受到尊重。利比亚战争中的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的现实状况使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民人权也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利比亚国家主权受损的明显例证之一，就是在卡扎菲政权仍然存续的情况下，由班加西反政府武装组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陆续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外交承认，被视为“利比亚合法政府当局”，由此就出现了前文中所提到的现代国际政治与法律实践中罕见的利比亚的“一国两主”局面。^① 利比亚这种独特的“一国两主”现象给法学与政治学带来了若干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新元素——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源究竟是什么？是上帝，是教会，是人民，还是武装叛乱与占领？判断国家政权失去合法性的根据是什么？战争中国家如何在维护主权与保障人权两种法益间寻求平衡？国际人权干预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标准是什么？战争作为国际人权干预的手段，须把握的必要限度与基本条件又是什么？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国际承认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先例吗？它客观上会给别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影响与效应，等等，都是需要加以慎重思考的问题。

总之，动荡中的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动荡中的阿拉伯世界，给现代法学与政治学提出了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的新的研究课题。认真研讨这些问题，对于推动法学与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沟通与合作，构建现代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冯玉军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强世功 《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徐显明主编 《国际人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

姚建宗主编 《法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

责任编辑：苏 成

^① 利比亚国家主权受损的事实是多方面的。例如：2011 年 10 月 26 日，卡塔尔军方承认，在持续 8 个月的利比亚内战中，卡塔尔军队一直派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作战，而之前卡塔尔只承认过派遣空军参与打击卡扎菲的行动。这明显是对利比亚国家主权的侵略与颠覆。